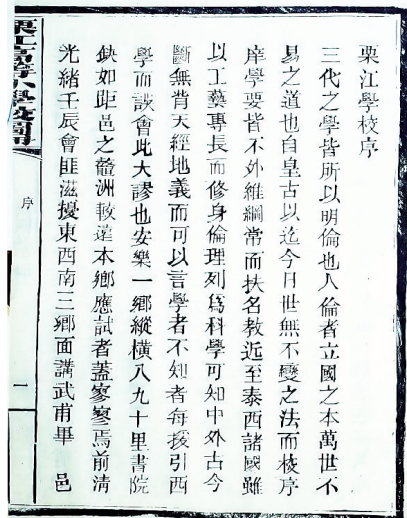




▲《栗江高等小学图册》卷一《栗江学校序》

“世界愈文明，科学愈发达，此泰西各国所以学校日增，有无事不学、无人不学之盛况也。”这句话是萍邑生员廖玉琳在《栗江学校序》开篇所述。

甲午战争后，国人大惊，猛然发觉中国已远远落后于世界，传统科举选拔的人才已无法满足国家的需要。“今日五洲，交通、汽船、火车之路线贯彻全球，白种人方以全力推阐实业、学问，我国人若墨守旧章，引导幼年学子日从事于经、史、子、集，置各种科学而不顾，何能与泰西争胜？”不少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教育事业，试图通过“教育救国”来挽救危局。

1901年，清政府下达书院改制上谕，明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着各督抚、学政，切实通飭，认真兴办”，此后各省书院陆续改制成学堂。1902年，张百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在此基础上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1904年1月，清政府正式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1905年，全国兴起“废科举、兴学堂”的呼声，清政府随即废除科举制度并宣布选拔新式人才。

萍乡地处湘赣边界，自古就是崇文重教之地，在科举改制的大背景下，萍乡知县顾家相及文廷式、萧立炎等开明士绅以“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谳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为宗旨，依托萍乡旧有的

风雨变革兴学堂 万世传扬润书生 清末萍乡新式学堂的兴办

■章廷钰 凌焰

湘潭、凌云、栗江四所高等小学校；三是由社会捐资新建，如崇实、宣风、西区、南溪、明峰等高等小学校。以崇实高等小学校为例，这个学校以一乡为单位，创办及日常运作的资金依托于里人捐资和田租收入，开明士绅在其中起到带头捐资、传播新式教育理念的作用。萧燮和在《西区高等小学记》中写道：“西区，右文之区也，诸父老矍然于根本之图，其于学校，正相需甚殷；风会所至，力能负山涵海而趋所由；识时之彦，倡导于前而务及远大之，各姓亦遂能急公仗义于后也。”可见这一学校的建立依靠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关于小学教育的理念，廖玉琳在《栗江学校序》中提到：“虽栗江仅为一乡小学，表面上似无关重要，然而天下之大，一乡之所积也；大学诸生，皆由小学而升也；小学不端其趋向，大学安所用其甄陶？”陈启和在《崇实高等小学堂记》中写道：“所愿操斯堂教育之权，及来学于斯者，尊崇故训，广以新知，以社会进化为己责，共体时艰，仰抒国难。吾知必有奇杰之士发迹其中，以为乡土之光。”可见当时萍乡人民将小学教育置于立德树人的救亡图存的层面，凸显出小学教育的重要作用。

除公学外，在士绅阶层和宗族势力的扶持下，各地的私立学堂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私立学堂多为乡学或族学，这些学校通常以宗祠或寺庙为校舍，宗族产业及各方捐赠作为资金，生源为本族、同乡或邻乡的儿童。刘洪辟在《泉蒙小学校记》中写道：“教育始于家庭，而初基端于蒙养。族学，即家庭教育所施；小学，即蒙养之初基所定也。”养正国民学校，是附贡生蔡定远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联合柳映溪等开明士绅创办的。这所私立小学在创办伊始就困难重重，除资金困难外，当地宗族中的顽固派也层层阻挠。直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将校址迁往莲池庵后，在村民捐款、寺庙捐赠和宗族势

力的帮助下才得以继续办学。这一过程中，以蔡定远为代表的开明士绅一边与顽固派斗争，一边想方设法募集资金办学，在艰难中推进乡学事业的发展。蔡定远等士绅也无愧于其“所望地方，继起有人竭力维持，或从此而扩充其经济推广其教育，以无负为国育才之至意”的办学宗旨。

除了部分开明士绅，不少宗族势力也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在他们的努力下族学得以兴办起来。如南门张氏族学“光绪三十三年开办，由祠会提额租百石为基金，报县申详备案，建筑新式校舍于祖屋左侧”；白源张氏族学“由祠会提额租百石为基金建设，就祠堂为校舍”；登岸峡姚氏族学“以祖祠左边房屋为校舍，提祠会额租为基金，经费甚裕”。除此之外，三山胡氏、石观前刘氏、流江黄氏、芦塘彭氏、周江边李氏、院背李氏和大院欧阳氏等宗族皆设有不同规模的族学，共有43所之多。私学的兴办将新式教育扩展到乡里，弥补了公立学堂的不足，为萍乡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颜氏家训》的这句名言道出了教育的重要性。明清以来萍乡盛行崇文重教之风，从科举时代的六堂宾兴到清末创办新式学堂，萍乡人抓住机遇，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秉着“教育救国”“为国育才”的理念，将萍乡建成文化昌盛之乡。得益于新式教育，萍乡在当时的中学生人数位居全省之首。在此基础上，有10人赴法国深造，归国后大部分成为技术专家。有16人赴日本留学，人数居全省之冠，汤增璧归国后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成为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启蒙者、引路人之一；黄序鹄成为著名经济学家，撰写出《中国经济史长编》。1898至1948年间有46名萍乡学子考入北京大学，人数居江西各县之首。毕业于黄埔军校（1至23期）的萍乡籍学员超过500人。

专栏主讲人：

凌焰，男，1983年生，萍乡麻山人，历史地理学博士、教授，现任萍乡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安源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萍乡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萍乡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兼职）。主持国家社科规划一般项目1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1项、省社科规划项目3项、省艺术社科规划项目1项、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1项，横向课题3项。在《史林》《历史地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农村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篇。研究方向：明清以来湘赣边区民间文献收集与基层社会组织研究。

文物故事

古人喜用“龙装备”喝一杯？

■新华社记者 喻珮 王学涛 冯维健

一件有几十只小龙层叠盘旋的巨型温酒器、一只整体形似龙舟的觥、一张龙飞凤舞的错金银案几……三件分别出土于湖北、山西、河北的青铜礼器以各具特色的龙元素，凑齐一组“龙装备”。它们以雄浑古朴的造型、绚丽精美的纹饰，展示了先秦时期精妙绝伦的青铜铸造技艺，如今均为禁止出境的国宝。

远看像一团团云朵，实际上是龙、蛇、蟠螭层层叠叠、盘旋环绕组成的镂空纹饰，让人眼花缭乱的时深感震撼——它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复杂、最精美的青铜器之一曾侯乙尊盘。这件文物于1978年在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国国君曾侯乙墓中被发现，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尊盘由盘和置于盘中的尊两件器物组合而成。尊是盛酒器，盘是水器，冬季可盛沸水用于温酒，夏季可盛冰用于镇酒。全套器物通高42厘米，重近30公斤。尊体共装饰有28条龙、32条蟠螭，腹部和圈足满是蟠螭纹和浮雕的龙；盘体装饰56条龙、48条蟠螭，盘足为四条圆雕的双身龙，龙首、龙体、龙尾蜿蜒曲折，表现出充沛的生命力。

“这件文物上的龙纹饰以数量之多、造型之精美而闻名。”湖北省博物馆陈列部主任曾攀说，曾侯乙尊盘的“零部件”数以百计，得以构成繁缛的纹样，又呈现高低参差和对称排列的整体造型，可谓“巧夺天工”，“其组装数量多、复杂程度高，一直无法被复制”。

“商人好酒”。商代的青铜器中，酒器种类丰富。山西博物院有件60多年前出土于山西省楼县的龙形觥，造型别致、纹饰精美，通高17.7厘米，通长42.5厘米，重4310克，容积1620毫升。与一般青铜觥将兽头装饰在器盖的前

端、后部有鋬的情况不同，它更像一只龙舟。

觥的前端为昂首龙头，瞳目张角，觚牙咧嘴为流。器盖正中有菌状的钮。腹部前窄后宽，两侧各有两个方形系，穿上绳子可将器物提起。觥上还有龙、蛇、鳄鱼等为主的大小纹饰20多条。它们相互纠结，又疏密有致，与器形的简洁典雅相辅相成。

“这个觥的盖面上的龙纹龙身蜿蜒、尾部卷曲，与前端的龙首相衔接，平面图案与立体形象相结合，十分巧妙。其龙角及菌状钮为先铸，最后再铸接到器身和盖面上。”山西博物院藏品研究部副主任崔跃忠说，这件器物是商代晚期方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作品。

酒器需要桌来配。在河北博物院，有一件战国时期的错金银四龙四风铜方案，1977年出土于河北平山县三汲村一战国古墓。它通高36.2厘米，重18.65公斤，底盘由4只梅花鹿承托，底盘之上挺立着4条神龙。在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凤鸟引颈长鸣、展翅欲飞，整体造型动静结合，可谓龙飞凤舞、新颖奇特。

案是我国最古老的家具种类之一，是古人日常放置物品的小桌子，也可用于伏案而息。这件铜方案被发掘出来时，漆制案面已朽，只剩案座。整件文物集铸造、镶嵌、焊接等多种工艺于一体，设计复杂精巧；还施以错金银工艺，金光银影间双色闪动。

“匠人将想象中的龙用智慧和技术凝结成一件件绝妙之作。”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说，商代后期，青铜冶铸业臻于鼎盛。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失蜡法等技术的发明和使用，青铜器铸造工艺进一步改进，技术难度降低，生产规模逐渐扩大。这三件龙形器物都是多次铸造完成的，代表了当时的科技水平和文化艺术水平。



◀曾侯乙尊盘
▲曾侯乙尊盘的盘口沿龙形附饰

◀错金银四龙四风铜方案
▲错金银四龙四风铜方案的龙形案身

◀商代龙形觥
▲商代龙形觥器盖上的龙身纹饰

党史中的萍乡故事

一口米缸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当部队到达莲花县甘家村时，一个老表也碰不到。原来，人们以为是旧军阀来了，青壮年害怕被抓壮丁都纷纷往山里逃跑，其他人能躲的也都躲藏起来了。

村里有个叫陈娇枝的年轻孕妇，本来要跟大家一起躲起来，却正好赶上分娩疼痛难忍，丈夫陪她到自家破柴房里生下了一个男孩便慌慌张张逃了。陈娇枝用棉絮把孩子包好，尽量让孩子的哭声小一点。不一会儿，外边传来一阵脚步声，有人大声喊：“屋里有人吗？”连喊几声她也没敢应答。一阵轻微响动之后，脚步声便远去了。

其实，陈娇枝的丈夫并没有逃远，因为惦记家中的老婆和孩子，部队一离村他便回到了家里。看到母子俩平安无事，他十分高兴。到自家西偏房一看，只见剩下的半缸米不

见了，米缸里塞了一床棉絮和四块银元，上面放着一张纸条，写着：“对不起，我们刚到你家找不到人，把你们的米拿去吃了，给一床棉絮和四块银元作为赔偿，请收下。”两口子非常感动，觉得碰到的这支部队“真是世上最好的军队”。为了纪念这支好军队，陈家把米缸当成了传家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家翻了身、分了地、添了新家具，唯独这口米缸舍不得换。几十年过去了，米缸裂了条缝，陈娇枝就用桐油掺些石灰补了补继续使用。

1969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派人到莲花县甘家村征集文物时，陈娇枝将这口米缸捐了出来。1994年，这口米缸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了工农革命军遵守纪律、维护群众利益的历史见证。

（来源：人民日报）

待客节令

惊蛰：春雷惊万物 蛰虫唤银锄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郭慕清

一声春雷响，人间万物苏。

惊蛰，古称“启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始。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蛰”释为“藏也”。元代文人吴澄编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写道：“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古人认为，动物冬藏伏土，不饮不食，当春雷隐隐，大地回暖时，它们就被惊醒了。其实，这主要还是温度变化的结果。

古代文人颇爱描写惊蛰，留下不少千古流传的诗篇。唐代韦应物的一首《观田家》，甚是有趣，有几句这样写道：“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饯西涧水。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

寥寥几句诗，描绘出一幅春季农家耕种的画面。春雷乍响，乡间阡陌，草木萌新，细花吐蕊，年轻力壮的男子穿梭在一片春意里忙碌着。他们耕牛犁地，饮牛溪涧，虽然累却不叫苦，一场贵如油的春雨降下，就让他们雀跃无比。

唐代农业非常繁荣。诗人元稹，当过宰相，重视农桑，他曾写过二十四节气诗，流传至今。

我国古代将惊蛰分为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黄鹂）鸣，三候鹰化为鸠。元稹对惊蛰的描写贴合这“三候”，他写道：“阳气初惊蛰，韶光大地周。桃花开蜀锦，鹰老化春鸠。”

轻雷惊春，万物变化，有东风劲、韶光暖，也有花雨香和鸟雀鸣。元稹通过诗情画意的语言，一点点在天地间慢慢铺展

开来的斑斓春色，揉在字里行间。读之，仿佛身临其境。

惊蛰时分，有不少民俗，“驱虫”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因“春雷惊百虫”，老百姓担心蛇虫鼠蚁等殃害庄稼，或滋扰生活，所以会驱虫。《千金月令》记载：“惊蛰日，取石灰掺门限外，可绝虫蚁。”

在民间，还流传“惊蛰吃梨”的民俗。在传统文化中，一般节日忌讳吃梨。不过，此时吃梨，寓意着和害虫分离，远离疾病。俗话有云“冷惊蛰，暖春分”，从养生的角度讲，仲春时节还是乍暖乍寒，容易口干舌燥，吃梨可以助益脾气，令五脏平和，可增强体质，抵御病菌的侵袭。

除了诗词和民俗，仔细品读“惊蛰”二字，便觉其中意蕴无穷。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萧放表示，要了解惊蛰内涵，单从“蛰”字的字形演变就能管窥一二。小篆体的“蛰”字，底部是一只盘缠的小蛇，上半部的“执”表声，本意是束缚不动，上下部分合在一起，形象描写了昆虫从凛冽寒冬到初春这一段时间蛰伏冬眠的状态。当惊雷一声凌空响，叫醒了百虫，也叫醒了希望。动静切换之外，大地万物积蓄了一个冬天的力量也在蓬勃生发。

《尔雅·释诂》中曰：“蛰，静也。”正如古人所说“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世间纷纷，总有起伏，因此古人常以“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来自勉，指人应相时而动，因势而变。有时，“蛰”是为了“惊”，需当“蛰”而伏，当“惊”便起，这也是惊蛰带给人们的重要生存智慧和人生哲学。

文化传真

殷墟新馆！来赴这场“千年之约”

■新华社记者 唐健辉 施雨岑

河南安阳，洹水之滨。一座青铜色的博物馆大气庄重，与殷墟官殿宗庙遗址隔河相望——这是殷墟博物馆新馆。近日，这里正式面对公众开放。

青铜器、陶器、玉器、甲骨……约2.2万平方米的展厅内，近4000件套文物令人目不暇接。展陈文物数量之多、类型之全，都是商代文物展览之最。它们静默无声，却生动而鲜活地“讲述”着“商”是一个何等伟大的文明。

在新馆一楼车马遗迹专题展厅内，考古工作者正在仔细清理殷墟遗址出土的马车实物标本。10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集中展示了殷墟出土的23辆马车。

手铲微微倾斜，轻轻刮落表层泥土，再用竹签沿着土层纹路慢慢清理，最后用刷子扫去表层浮土，一个清晰的车轮遗迹便在考古工作者手中显露出来。这场开在博物馆的“考古公开课”载着游客穿越3000年时光，一窥当年“车辚辚，马萧萧”的壮观景象。

新馆三楼，110余片首次展出的甲骨记录了一位商朝小王子的生活日常。考古工作者推测

“子”是商王武丁和王后妇好的儿子，是一位热衷于占卜的问卜者。其中一条“子其疫，毋往学”的卜辞，引起了许多游客的兴趣。

“这条卜辞记录着‘子’入学后有一日生病，但又不敢无故旷课，于是他就占卜，这次的疾病是否严重？我是否能去上学？”殷墟博物馆讲解员胥怡雯说，这条卜辞被称为“3000年前的请假条”。

90多年的考古成果积淀之下，商，不再只是《史记》中3000余字的记载。它有血有肉、真实而立体，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蕴藏其中。

“殷墟博物馆新馆的建设，致敬殷墟90余年的丰硕考古成果和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致敬中国考古学百年辉煌。”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说，大量精美绝伦的文物，从不同的角度展现出3000多年前青铜文明的鼎盛面貌，也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商代巧夺天工的技术工艺。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你，准备赴这场“千年之约”吗？